

何 军,祝丽琴. 土地流转中契约期限的选择:长期还是短期?——基于湖北省孝昌县的实证分析[J]. 江苏农业科学,2018,46(8):320-324.
doi:10.15889/j.issn.1002-1302.2018.08.078

土地流转中契约期限的选择:长期还是短期? ——基于湖北省孝昌县的实证分析

何 军,祝丽琴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苏南京 210095)

摘要:土地流转是当前我国农业与农村转型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提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交易成本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研究假说,基于湖北省孝昌县 220 户调研数据,运用 Heckman 两阶段法实证分析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与契约期限选择机制。结果表明,农户非农人力资本与契约期限的负向关系得到了一定的验证;社会资本中的个人社会资本对农户土地流转及契约期限选择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村庄社会资本的影响则相反;资产专用性越高,越有利于促进农户选择长期契约。实证结果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所提出的研究假说,基于此提出的几点建议将有助于提高土地流转率和契约期限,在稳定农村土地流转的同时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措施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

关键词:土地流转;契约期限;资产专用性;社会资本;Heckman 两阶段法

中图分类号:F32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8)08-0320-05

当前我国正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过渡的转型时期,土地流转作为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长期以来备受中央政府重视。土地能否稳定流转是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主要表现在流转率与契约期限选择上,而当前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现状是流转率偏低、期限过短,且多数是农户间自发流转,普遍存在不签契约、口头契约甚至空契约的现象。政府为促进土地流转相继出台了一些重要政策措施,如开展农村土地确权工作,推动土地所有权、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置,放活土地经营权等,对推动土地稳定流转、提高流转效率起到了积极作用。农业部统计数据 displays,2011 年全国家庭承包经营耕地流转率为 17.84%,2014 年达到 31.36%,增长了 75.78%;而湖北江汉平原作为劳动力大量输出的地区,其土地流转水平反而较低。因此,对湖北省孝昌县进行实地调查,研究该地区农户土地流转中的契约选择机制,对农户进行土地流转的行为以及土地流转契约期限选择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考察农户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并提出促进土地稳定流转的合理建议。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并解决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涌现的问题,提高土地流转效率与效益,为推动新型农业经营和实现农业现代化扫清障碍;同时,对政府改善相关措施、提高政策效率也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1 文献综述

关于土地流转与契约期限选择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交易本身属性即交易成本方面,包括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与不确定性。Williamson 等曾从不同层面揭示了交易成本与契约的关系,指出交易成本与契约不完全性会引发投资激励不足和契

约短期化倾向,而短期契约又反过来抑制投资的专用性^[1-3]。Cheung 则首次以制度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了交易成本与土地流转之间的关系,认为交易成本会显著影响农户契约期限的选择^[4]。交易成本中的资产专用性是众多学者关注的重点,Crawford 认为,资产专用性是解释长期契约与短期契约替代问题的关键^[5];罗必良等对土地流转和契约期限的研究结果表明,长期契约可以有效降低交易成本,而投资的资产专用性与契约期限成正向关系^[6];邹宝玲等认为,农户对土地的专用性投资以及对租约谈判能力的不足是其选择短期契约的关键影响因素^[7]。此外,李孔岳从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的角度探讨了土地流转中的交易费用^[8];刘文勇等分别从转入方和转出方的角度考察了地权稳定性与交易费用对双方契约选择的影响,认为地权不稳定时转出者倾向于长期契约,而转入者倾向于短期契约,但交易费用较高时两者都倾向于选择长期契约^[9]。可见,交易成本尤其是资产专用性对土地流转中农户对契约期限的选择有重要影响。

在人际关系、个人社会网络与土地流转关系的研究上,已有研究表明人际关系与社会网络作为信任的基础与信息传递的桥梁,对农户行为有显著的约束作用,从而对土地流转交易产生影响。如 Maertens 等研究表明,社会网络对农业新技术的采用及家庭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有显著的影响^[10-11];Robison 等则发现,农村中的社会关系会明显改变土地的交易形式^[12]。国内学者张文宏指出,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降低社会行动中的交易成本,社会交往中形成的信任和约定俗成的规则为土地流转提供了便利^[13];安海燕等的实证研究表明,流转双方关系越密切,社会网络关系越强,越倾向于口头契约^[14];陈浩等的研究同样发现,社会网络中的“强关系”对土地流转有正面影响^[15]。

此外,也有一些研究关注土地属性、农户特征对土地流转的影响。土地对农民来说具有强烈的底线保障作用,被认为是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后的退路,其承担的福利保障及经济价

收稿日期:2017-09-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编号:11&ZD010)。

作者简介:何 军(1964—),男,河南郑州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经济理论、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E-mail:hejunnj@163.com。

值功能使农民对土地有极大的依附性,从而使得土地的某些属性与契约选择密切相关。有研究表明,农户缺乏养老保障和失业保险是阻碍农地长期流转最主要的因素,土地质量也对流转期限存在明显影响^[16]。在农户特征方面,通常受教育程度越高、非农就业能力越强,农户在土地流转时越倾向于选择长期契约与书面契约^[14,17],但也有观点认为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户越可能发现土地的潜在价值,从而越倾向于选择短期契约^[7]。同时,对土地转入者来说,其务农年限越长,越倾向于长期契约,对土地转出者来说则相反^[18]。

综上所述,当前从不同角度对土地流转和契约期限选择的研究较为丰富,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和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地方,如交易成本中资产专用性的衡量存在争议与困难,较少研究涉及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对契约期限选择的影响等。本研究基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交易成本的理论框架,以更为全面的视角深入探讨土地流转与契约期限选择机制,在丰富现有研究的同时提出创新性的讨论,以期对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有意义的参考。

2 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说

农户决定土地是否流转与选择契约期限看似是两步选择,实际上农户在决定进行土地流转的同时必定会选择流转期限,可以看作两者是同时进行的,即影响农户是否流转土地的因素也可同时作为契约期限选择的影响因素。但决定农户是否流转土地的变量会对契约期限的选择产生断尾作用,即存在着“样本选择”问题,只有进行土地流转的农户才会有契约期限,因此,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说是基于农户进行土地流转条件下的契约期限选择问题的探讨。影响契约期限选择的因素可以分为 3 类,即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交易成本(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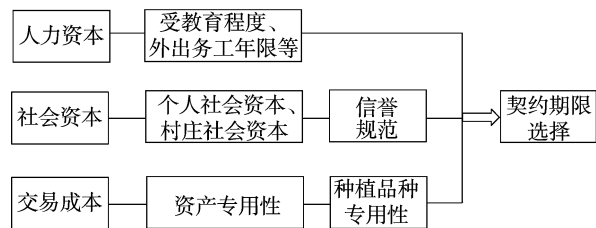


图1 契约期限选择理论框架

2.1 人力资本与契约期限选择

农户的人力资本主要包括受教育程度、身体健康状况、外出务工年限、年龄等。一般来说,农户身体越健康、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外出务工的可能性就越大,越倾向于选择长期契约;而家庭外出务工比例与非农收入占比越高、外出务工年限越长,积累的非农人力资本越多,务农的可能性就越小,进一步增强了选择长期契约的倾向。此外,农户年龄越大,身体健康程度越差,退出非农市场而选择返乡务农的可能性就越大,且由于土地的天然保障作用,通常年龄大的农户对土地的依赖程度较强,使农户倾向于不流转土地或尽量选择短期契约。湖北省孝昌县作为劳动力输出大县,大量人口长期外出务工,土地流转现象较为普遍,也较为契合本研究的主题。因此,本研究选择农户受教育程度、身体健康状况、年龄、家庭外出务工比例、非农收入占比和外出务工年限作为农户人力资本的代表变量,并提出研究假说 1:农户非农人力资本积累越多,

越倾向于选择长期契约。

2.2 社会资本与契约期限选择

农户的社会资本分为个人社会资本与村庄社会资本,个人社会资本为个人的网络关系,由家人、亲戚、朋友等一系列“强关系”和“弱关系”组成;村庄社会资本体现为农户对村庄的认同归属感及其对农户行为的规范约束,村庄社会资本在提高村庄凝聚力、提供社会化服务等方面起着促进作用,但最重要的是村庄社会资本对农户行为和土地流转市场的稳定与规范。农村的土地流转大多具有典型的乡土村庄特性,农户的社会资本对土地流转契约期限的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对农户社会资本加以考虑将是必要的。

个人社会资本与契约期限选择的关系建立在信誉机制之上。首先,信誉机制在契约选择中对参与人的外部选择有重要作用,制度学派认为信誉现象是以社会承认逻辑为前提的,这种逻辑往往形成以个人社会地位与关系为基础的“合法性”机制,即个人行为将符合法律制度、文化期待与习俗惯例等,也就是说信誉机制将会对个人行为产生重要约束;其次,契约期限选择的关键在于对信息的判断,借助农户自身的社会网络关系,可以有效获取潜在契约伙伴的相关信息,将有助于降低交易风险和成本。村庄社会资本与契约期限选择的关系建立在对农户情感的凝聚与对农户行为的规范基础之上,这些凝聚与规范通常通过农户对村庄农业生产性组织的依赖以及组织对农户行为的一系列约束来实现,如对于合作社而言,农户若想加入,必须遵守合作社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土地流转时合作社基于自身长远发展的考虑往往要求农户签订一定期限的书面合同,以规范农户行为,降低违约风险,对土地流转市场也起到了稳定作用。现实中我国农村社会是一个传统的熟人社会、亲缘社会和人情社会,农户的个人社会资本与村庄社会资本是其获取信息并做出决策的重要基础,显著影响着农户的选择行为。通常租赁双方关系越亲密,转出者越倾向于无契约或短期契约;而村庄社会资本越高,规范程度越高,转出者越容易选择长期契约。

综上,本研究选择春节拜访户数、与流转对象关系亲密程度作为个人社会资本的代表变量,选择村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育程度、村庄满意度作为村庄社会资本的代表变量,并提出研究假说 2:个人社会资本与契约期限选择呈负相关,而村庄社会资本与契约期限选择呈正相关。

2.3 交易成本与契约期限选择

Williamson 的交易成本理论认为,由于人的有限理性以及交易过程不可预见的各种状况,契约天然是不完全的,将每次交易视作一种契约,那么交易成本将影响契约期限的选择^[1-2]。交易成本由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交易频率等 3 个维度的交易特性决定,其中资产专用性是决定经济交易成本最关键的维度,它是指用于特定用途后被锁定很难再用作其他性质的资产,若改作其他用途其价值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贬值。一般资产专用性越高,所产生的交易成本也就越高,契约期限越倾向于长期。对于农业经营主体来说,土地流转时所要考虑的资产专用性通常包括土地固定资产投资与种植品种专用性,种植品种专用性以流转出的土地所种植农作物的生长周期来衡量,例如果树木类的生长周期长于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其种植也将需要更多或更长时间的在土地上的

投入,资产专用性自然较高,容易形成“套牢”效应,因此土地流转时更加倾向于签订长期契约。

本研究以土地固定资产投资、种植品种专用性作为资产专用性的替代变量,并提出研究假说 3:土地流转资产专用性越高,农户越倾向于选择长期契约。

3 数据来源、变量说明与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湖北省孝昌县位于湖北省东北部、江汉平原北部,地貌多为丘陵,农业经营方式以传统的家庭小规模生产为主,新型农业经营组织较少,且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农村空心化现象严重,存在耕地抛荒的现象。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与重点抽样相结合的方法,选取孝昌县 4 镇 10 村的 220 户农户进行入户调研,调研时间为 2016 年 12 月 20 日至 2017 年 1 月 10 日,调研形式为对农户进行问卷访谈。样本农户地块总数为 1 418 块,其中土地流转的有 502 块,占比 35.40%,由于土地流入与流出均可视为发生土地流转,但为避免混乱、明确调查对象,笔者以土地流出为基准,调查土地流出农户与流出地块的信息;并且由于地块信息复杂,每户家庭地块可能流转给不

同的个人或组织,其契约形式与年限也不尽相同,因此笔者仅以地块为具体研究对象。

由表 1 可知,样本农户中发生土地流转的农户占比较高,总体达到 55.45%,但土地流转率较低,样本综合土地流转率仅为 20.07%,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土地流转农户占比高而土地流转率低的原因在于样本农户家庭平均拥有约 7 块地,但大多数家庭仅有一部分地块参与了流转。本研究所用变量及其定义、统计信息详见表 2。

表 1 样本基本信息与分布

地区	村庄数 (个)	农户数 (户)	土地流转 农户数(户)	土地流转农户 占比(%)	土地流转率 (%)
丰山镇	4	90	55	61.11	23.18
周巷镇	2	57	25	43.86	21.35
邹岗镇	3	53	31	58.49	16.54
花园镇	1	20	11	55.00	19.56
综合	10	220	122	55.45	20.07

注:土地流转农户占比为发生土地流转的农户数与总农户数的比例,农户有 1 块及以上地块流出就记为发生土地流转;土地流转率为样本农户土地流转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

表 2 变量定义与统计

类别	变量	定义	平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土地流转	否 = 0;是 = 1	0.35	0.478
	契约期限	年	4.84	1.563
人力资本	受教育程度	户主受教育年限	8.27	2.024
	身体健康状况	户主:很差(不能劳动) = 1;差(有疾病影响劳动) = 2;一般(不影响劳动) = 3;良好(身体较好) = 4	3.23	0.510
	外出务工年限	年	13.63	7.239
	家庭外出务工比例	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家庭总人数	0.57	0.014
	非农收入占比	家庭非农收入/总收入	0.82	0.026
个人社会资本	年龄	户主:周岁	51.26	9.090
	春节拜访户数	户	9.25	1.658
村庄社会资本	与流转对象关系亲密程度	合作社等组织 = 1;陌生人 = 2;同村或组但不熟悉 = 3;熟人 = 4;亲戚 = 5	4.02	0.317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育程度	村庄合作社、协会、基地等农业生产性组织	2.52	0.906
交易成本	农户对村庄的满意程度	很不满意 = 1;不满意 = 2;一般 = 3;比较满意 = 4;很满意 = 5	4.10	0.460
	土地固定资产投资	地块流转前 1 年内投资,如土地平整改良费用、水渠修建费用等(×10 ³ 元)	0.17	0.086
其他控制变量	种植品种专用性	生长周期短(水稻、小麦等农作物) = 0;生长周期长(果树林木或花卉等观赏性植物) = 1	0.46	0.499
	土地性质	旱地 = 0;水田 = 1	0.58	0.493
	土地质量	低 = 1;中 = 2;高 = 3	2.01	0.098
	离家距离	地块离家距离(km)	0.48	0.261
	租金性质	无租金或非现金 = 0;现金 = 1	0.56	0.497
	是否有农机设备	否 = 0;是 = 1	0.13	0.054

注:与流转对象关系亲密程度中土地流转对象为合作社等组织的视为亲密程度最低,原因在于合作社等作为集体组织,具有正式的各种规定条件,相比于陌生人个人与之谈判的能力更弱。

3.2 研究方法

农户土地流转决策实际上是决定是否流转和契约期限 2 个行为决策的有机结合,但由于是否发生土地流转的断尾与契约期限变量相关,当没有土地流转时就无法观测到契约期限,从而造成契约期限方程的偶然断尾与样本选择问题。这种情况下较为适合采用 Heckman 两阶段法^[19],第一阶段运用 Probit 模型分析农户是否进行土地流转以及进行土地流转的概率,在此基础上计算反米尔斯比率(inverse Mill's ratio,简称 IMR),并将其代入第二阶段契约期限选择的 OLS(ordinary least square,最小二乘估计法)回归中得到估计结果,Heckman

两阶段法有效解决了两步回归中变量通常相关造成的估计不一致问题。具体模型如下:

$$P(y = 1) = \Phi(\beta'X) = \int \frac{1}{\sqrt{2\pi}}e^{(-\beta'x/2)}dt。$$
 (1)

式中: X 为影响农户是否进行土地流转的解释变量; β' 为系数向量。对应农户不进行土地流转的函数表示为 $P(y = 0) = 1 - P(y = 1) = 1 - \Phi(\beta'X)$ 。

$$IMR_{ij} = \varphi(\beta'x/\delta) / \Phi(\beta'X/\delta)。$$
 (2)

公式(2)为反米尔斯比率函数,是标准正态密度函数值和标准正态累计分布函数值的比,将其带入第二阶段契约期

限选择的 OLS 回归方程:

$$T_{ij} = \beta_0 + \beta X + \alpha IMR_{ij} + \varepsilon. \tag{3}$$

式中: α, β, β_0 均为待估参数,其中 β_0 为常数项。 ε 为模型的随机扰动项。模型经过估计后可得到参数值。 T_{ij} 为第 i 个村第 j 个农户签订的契约年限,须要说明的是为避免 IMR 与第二阶段解释变量高度相关的可能性,一般影响第二阶段决策行为的变量是第一阶段变量的子集,即某些变量影响是否进行流转但对契约期限没有偏效应。

4 实证分析

4.1 描述性分析

样本农户家庭人口与土地特征如表 3 所示,样本农户户均农地地块数较多,达到 7.04 块,而户均土地流转面积(包括没有土地流转的农户)仅有 0.08 hm²,土地流转水平较低。从土地流转契约期限分布(表 4)来看,契约年限≤5 年的农户数量最多,占比达 53.75%,其次是契约单限为 10 年及以上的农户,占比达 41.25%,5 年< 契约年限< 10 年的农户仅占 5%。契约形式可以分为书面契约和口头契约,在土地流转的农户中,签订书面契约的农户占比为 43.13%,略低于达

成口头契约的农户占比;在签订书面契约的农户中,大多数契约为 10 年及以上的长期契约,而在口头契约中正好相反,大多数为 5 年及以下的短期契约。签订长期契约的农地大多用于种植生长周期较长的果树、林木、红梾等药用植物,签订中期契约的一般用于建设生态园、种植花卉等观赏性植物,很少用于种植农作物,而签订短期契约的基本都用于种植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

综合契约年限与形式的分布以及种植品种的选择来看,种植果树、林木类等生长周期较长植物的农户倾向于选择长期契约,而长期契约中又多为正式的书面形式,实际上对于长期租赁土地进行农业生产的农户来说,长期契约与书面形式是对其面临的较大的经营不确定性和风险的一种保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单方面违约。

表 3 样本农户基本指标

人口特征		统计值	土地特征		统计值
户均家庭人数(人)	4.48		户均农地面积(hm ²)	0.40	
户均劳动力人数(人)	3.40		户均农地地块数(块)	7.04	
户均外出务工人数(人)	2.56		户均土地流转面积(hm ²)	0.08	

表 4 契约期限与契约形式

契约年限 (年)	户数 (户)	书面契约		口头契约		种植品种
		户数(户)	占比(%)	户数(户)	占比(%)	
≤5	86	9	13.04	77	84.62	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
5< 且< 10	8	6	8.70	2	2.20	花卉等观赏性植物
≥10	66	54	78.26	12	13.19	果树、林木、药用植物类

注:由于同一农户不同地块的流转对象可能不同,同一农户可同时选择 2 种契约形式及期限,因此存在重叠部分,即 2 种契约形式农户的加总多于土地流转的农户数;对于口头契约形式,部分农户并未约定期限,本研究以最近转给同一人进行种植的年限作为契约期限。

4.2 计量分析

基于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本研究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资产专用性的角度对土地流转与契约期限选择进行计量分析。由表 5 可知,人力资本中受教育程度、外出务工年限对农户土地流转决策和契约期限选择均具有显著影响,但外出务工年限对土地是否流转的影响为负,家庭外出务工比例仅对契约期限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非农收入比重对二者均无显著影响;年龄对土地是否流转的影响为负,对契约期限无显著影响,而身体健康状况对土地是否流转无显著影响,对契约期限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通常受教育程度、外出务工年限等越高越有利于农户非农人力资本的积累,而非农人力资本的积累有助于促进土地流转,但实证结果仅部分支持本研究提出的研究假说 1,与研究假说不符之处,未能充分验证研究假说 1。

个人社会资本中的春节拜访户数对土地流转决策的影响不显著,但对契约期限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土地是否流转与流转对象关系亲密程度呈显著正相关,但与契约期限呈显著负相关,说明与流转对象关系越亲密,农户越倾向于选择短期契约。村庄社会资本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育程度对土地是否流转和契约期限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意味着村庄合作社、农民协会等组织越多,越有利于促进土地的长期流转;农户对村庄的满意程度也有利于土地的流转,但对契约期限的选择无显著影响。总体来看,个人社会资本与契约期限选择具有负向关系,而村庄社会资本与契约期限选择具有正向关系,这验证了本研究提出的研究假说 2。

交易成本中仅有种植品种专用性对土地是否流转的影响不显著,其余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资产专用性在农户进行土地流转决策和契约期限选择的过程中有着重要影响,且土地固定资产投资与种植品种专用性越高,越有利于达成长期的流转契约,符合研究假说 3。其他控制变量中,土地性质与土地质量对土地流转与契约期限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5 结论与建议

通过梳理总结已有研究文献,本研究提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交易成本的理论框架,基于湖北省孝昌县的调研数据,以较为全面的视角实证研究了农户土地流转行为与契约期限选择机制。研究结果虽然仅部分支持了本研究提出的假说 1,但充分验证了假说 2 和假说 3,说明社会资本与交易成本在农户土地流转决策行为中有着重要作用,而人力资本也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结合湖北省孝昌县土地流转率低、期限较短以及口头契约甚至空契约现象严重的现状,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以期能促进土地稳定流转,提高流转效率与效益,保障流转对象双方的权益,同时也有助于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农业现代化的长远目标。(1)政府与企业等各方应充分保障在城镇生活农民工的相应权利,重视对农民工进行一定的知识技术培训,增加其人力资本投资,将有助于促进和稳定土地流转;(2)政府应鼓励并积极引导农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因为其发育程度与土地流转和契约期限呈正

表 5 模型估计结果

类别	变量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系数	Z 值	系数	Z 值
人力资本	受教育程度	0.065 ***	2.76	0.347 *	1.67
	身体健康状况	-0.005	-0.05	-0.094 *	-1.73
	外出务工年限	-0.012 **	-2.15	0.415 ***	5.28
	家庭外出务工比例	-0.259	-1.32	0.036 **	2.05
	非农收入占比	-0.245	-0.89	0.435	1.61
个人社会资本	年龄	-0.017 **	-2.48	-0.189	-1.30
	春节拜访户数	-0.186	-0.18	-1.447 **	-2.01
	与流转对象关系亲密程度	0.253 **	2.54	-0.704 *	-1.83
村庄社会资本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育程度	0.431 ***	8.99	1.607 **	2.35
	农户对村庄的满意程度	0.211 **	2.32	3.33	0.52
交易成本	土地固定资产投资	0.450 ***	4.67	1.201 **	2.25
	种植品种专用性	0.652	1.43	0.159 ***	3.58
其他控制变量	土地性质	0.827 *	1.73	0.903	0.47
	土地质量	1.237	0.91	1.457 *	1.68
	离家距离	0.497	0.17		
	租金性质	0.043	0.06		
	是否有农机设备	1.326	0.83		
	常数项	-0.883	-1.40	1.336 *	1.93
	IMR			-4.662 ***	-4.11
	Wald χ^2 (14) = 119.98	Prob > χ^2 = 0.000 0			
	观察值与受限观察值	1 418		502	

注：“*”“**”“***”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影响显著。

向影响关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增加可以有效吸纳转出土地,且农户与合作社等组织倾向于签订长期契约,因此该措施对提高本地区的土地流转率、提高契约期限具有重要作用;(3)不论土地流转期限是长是短,政府应鼓励农户签订书面契约,必要时可提供统一的契约模板供农户使用,在规范契约签订的同时对稳定土地流转也是一种保障,同时,书面契约中多为长期契约,鼓励农户签订书面契约对提高契约期限将有一定的作用。

此外,在调查中发现口头契约中相当一部分(74.73%)农户未约定土地流转期限,但大多数都会自动延续时间,笔者称之为“可持续性契约”。可持续性契约可能与农户外出务工的不确定性以及恋土情结具有一定的关系,对其更进一步地探讨将作为以后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参考文献:

[1] Williamson O E.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firms, markets and relational contracting[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5:15-103.

[2] Williamson O E. Transaction - cost economics: the governance of contractual relations[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79, 22 (2): 233-261.

[3] Klein B, Crawford R G, Alchian A. Vertical integration, appropriable rents and the competitive contracting process[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78, 21 (2): 297-326.

[4] Cheung S N S. 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83, 26 (1): 1-21.

[5] Crawford V P. Long - term relationships governed by short - term contract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8, 78 (3): 485-499.

[6] 罗必良, 李尚蒲. 农地流转的交易费用: 威廉姆森分析范式及广东的证据[J]. 农业经济问题, 2010 (12): 30-40.

[7] 邹宝玲, 罗必良, 钟文晶. 农地流转的契约期限选择——威廉姆

森分析范式及其实证[J]. 农业经济问题, 2016 (2): 25-32.

[8] 李孔岳. 农地专用性资产与交易的不确定性对农地流转交易费用的影响[J]. 管理世界, 2009 (3): 92-98.

[9] 刘文勇, 张悦. 农地流转中农户租约期限短期倾向的研究: 悖论与解释[J]. 农村经济, 2013 (1): 22-25.

[10] Maertens A, Barrett C B. Measuring social networks' effect on agricultural technological adoption [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13, 95 (2): 353-359.

[11] Narayan D, Pritchett L. Cents and sociability: household income and social capital in rural tanzania [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99, 47 (4): 871-897.

[12] Robison L J, Myers R J, Siles M E. Social capital and the terms of trade for farmland[J]. Review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02, 24 (1): 44-58.

[13] 张文宏. 社会资本: 理论争辩与经验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03 (4): 23-35.

[14] 安海燕, 洪名勇. 农户农地流转契约形式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 545 份问卷调查数据[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6 (5): 12-17.

[15] 陈浩, 王佳. 社会资本能促进土地流转吗?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研究[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6 (1): 21-29.

[16] 李承松, 杨朝现, 陈兰, 等. 基于农户收益风险视角的土地流转期限影响因素实证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5, 25 (5): 66-70.

[17] 徐珍源, 孔祥智. 转出土地流转期限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转出农户收益与风险视角[J]. 农业技术经济, 2010 (7): 30-40.

[18] 钟文晶, 罗必良. 契约期限是怎样确定的? ——基于资产专用性维度的实证分析[J]. 中国农村观察, 2014 (4): 42-51.

[19] Heckman J J. Sample selection bias as a specification error[J]. Econometrica, 1979, 47 (1): 153-161.